

# 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上）◆ 钱之俊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写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件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 一生与信的渊源

钱锺书的一生与书信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上中学以后，他就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为父代笔写信开始，走出家门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写信。考上清华后，钱锺书每次写信给父亲的信都被老夫子贴在本子上珍藏，整理为“先儿家书”。“信写的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钱基博高兴起来还把自己教训儿子的家信拿出来发表，也把儿子的来信拿出来“显摆”。

在钱锺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时，书信都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他与杨绛分开之时。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情深，早已是现代文化圈中的佳话：“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我们仨》）解放后依旧如此。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而随着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钱锺书的读者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

炼，钱锺书信便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杨绛《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可惜的是，这批“情意绵绵”的家信，大多已被杨绛先生烧毁。

其实在电话并非寻常人可用的时代，书信往来一直是人际交往的必然选择，老派文人更是寄托于此。在信息化的今天，八行书笺，毛笔行书，早已是遗风雅韵的奢侈品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在钱氏最后二十年中，即使在电话、交通等都极为便利之时，他仍然每天认真地写着信。

## 晚年信札的数量及特点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来者无”。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



晚年钱锺书

多，另有其妻女书信及手稿等。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东方早报》2011年10月9日）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许渊冲在一篇《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0篇钱先生的来信。已出版的有关钱氏的研究著作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钱札。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计，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可以期待的是，《钱

锺书书信集》必是钱锺书身后又一部值得玩味的大书。

翻译家宋淇曾说过读钱锺书信的感受：“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钱锺书给他的信用毛笔、圆珠笔、打字机的都有，似乎信手拈来，语言都是文言文，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宋以朗说：“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有段时间因为钱的信太短，加上圆珠笔字迹易化难认，不便保存流布，宋淇竟给钱锺书寄来了一包好笔好纸！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后复信道：“弟性下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可见其赏钱函已是他朋友圈中一件赏心悦目的雅事。文言文，八行笺，挥洒自如的行楷，丰富幽默的语言等，这是钱氏给朋友信札的外在特点。此外，信中讨论学术，谈论论文，甚至臧否人物等，也另有其学术价值。

## 那些无穷的“后患”

钱锺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这和胡适、吴宓等把日记当作著作写不一样），给大师钱锺书留下了“无穷后患”。杨绛先生也承认“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我们仨》）曾有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的信札，不到10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2013年保利公司官网挂出的三封“钱锺书、杨绛致同贤先生信札”，估价竟达万元至18万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后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拍卖的三封信中有两件是“伪造”的。）

#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 8.掩埋尸体

情急之中，教导员抄起钢钎插入洞口空隙间，与铁路工人一起撬水泥板。这一撬管用，洞口果然有些开大了，刘文华乘势死劲朝外推幸存者，驾驶班长狼劲拉，教导员和铁路工人拼命撬住水泥板，上来了，下面的人得救了……

“扑通！”教导员用力过猛栽倒在碎砖坑内，大家赶紧扑过去。刘文华和驾驶班长托起教导员：“教导员，你怎么了？我们马上送您去医院！”

高压电线杆东倒西歪地竖着，断裂的高压电线瘫软在地面上。倒塌的建筑物隆起一座座废墟。横七竖八的水泥板下，不时传出阵阵哀号：“妈啊，娘，爸啊……”东西方向的柏油路上，挤满了军用车辆，救灾人员东奔西跑。

唐山发电厂宿舍区几乎夷为一片丘陵，没有一块平地能容纳百十号人列队。我们在公路北侧的一块突兀的地上站成二列横队。连长紧皱着黑脸宣布：“同志们，现在是7月29日凌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扒挖尸体，就地掩埋尸体！”指导员紧急动员：“同志们，人民至高无上，一切为了人民！为了灾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应在所不惜！现在扒挖尸体，尤其要注意抢救活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必须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全连共产党员，唐山人民在受难，唐山人民在挣扎，我们赶快行动啊！”

我们冲上废墟，拼力扛起、推开一块块水泥预制板。我们仅在行军途中吃了点咸水牛肉块，到了唐山根本不可能吃上饭，却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偌大一块水泥板，一人就能扛起推开。再大的水泥板也就是两人扛起推开。

遇难者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有的头靠门框，后脑壳被砸瘪了；有的被屋顶横梁拦腰砸断；有的被砸得四肢分离；有的被箱子或柜子压得一塌糊涂；有的头部被压在门外，屁股撅在门内；有个姑娘下半身被挤在墙壁夹缝里，血水溅满上半身；有一家人被闷在房屋里，妻子死死地抱住孩子，丈夫则拉住妻子不

放；有对青年夫妇抱在一起被捂死在床上；有的已经跑到门外，却趴在门前没有起来；有的从楼上跳下被倒塌的墙壁盖住……

眼前的异常残酷的惨状，惊得我们呆如木鸡。连长和指导员站在倒塌的房顶上大声喊：“大家只能用手扒挖尸体，不得用任何工具！快下手！”战友晋太和立即响应：“大家别怕，学着我的样子，下手吧！”他拉着一具男尸，抱起来就走。尸体太重了，只见他大模大样摇摇摆摆地下了废墟。难以置信，平时沉默寡言的山西籍农村兵晋太和竟然如此胆大，这首先开记录究竟为了什么？这就是为了人民的一切，我们必须赴汤蹈火！我忘记了平时见了死人就躲开的胆量，也抱起一位死难者，一步一步地下了废墟。

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我们用锹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放入，再理上土。我们见尸体就扒挖，就掩埋，究竟扒挖和掩埋了多少具尸体，谁也不愿计算，这大概就叫不计其数吧。

太阳时隐时现地顶在头上，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埋满了尸体，还有很多尸体无处入埋，连长和指导员为难了。我们得以稍事休息，顿感异常疲劳，汗水早已湿透了军装，所有战友军装背部都显出了一块圆形的白色盐花。

炊事班的同志将营房里带来的冷馒头蒸了蒸，发给每人三只，作为午饭。我们找水洗手，哪里有水呢？只得双手拍打拍打，就势在军装上揩一揩，拿起馒头就咬。狼吞虎咽地吃掉三只馒头，人人感到口干舌燥，渴望喝水！

连长和指导员更是渴得要命。两人苦思一阵，命令我们拿茶缸到大路旁集合，随即列队到驾驶班长处领水。我诧异了，驾驶班长不是自来水龙头，他哪来的水？当第一位同志遵命从汽车水箱下接了一缸缸水之后，我恍然大悟：每人领到的一茶缸水是汽车水箱里放出来的，这是连首长的良苦用心。为了保证连队的机动性，全连人员适可而止地饮完了三辆轿车水箱的水。喝了汽车水箱里的水，汽油和铁锈味混合着沁入肺腑，很多战友呛得直咳。

尸体，占满了空地。尸体，又从废墟中被战士们扒挖出来。连长和指导员面面相觑，彼此眉间都皱成了一个问号。十分钟后，他们命令我们赶快把尸体抬到能开动的车上，运尸体到郊外去掩埋。

## 4.请求帮助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高层和红军官兵极为振奋，因为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思想与行动纲领，均需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和指导。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而言，他们千辛万苦长征到陕北，本来也是毛泽东在看报时偶然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其实是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被迫撤到这片贫困、荒凉、狭小的地区的，因而从长远考虑，陕北绝非可图大举之地。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考虑与其困踞陕北，倒不如开拓更广阔的根据地。

基于这一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的考虑，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联名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帮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则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新疆，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内蒙……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肃西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甘、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共产国际的求援，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诚恳地表达了陕北根据地难以继的恶劣形势；二是巧妙地地点了日本帝国主义截断中苏关系的危险性；三是迫切地要求开辟新的根据地，也即制定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这三点中第二点最能打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为当时世界形势极为严峻，作为世界强国之一的苏联，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面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严重威胁，环境十分危险。由于苏联的外交重点在欧洲，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法西斯德国是主要危险。1935年3月，德国公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着手组建空军，这给西方世界带来极大震动。1936年2月27日，针对德国的威胁，法国议会批准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正式生效。3月7日，德国借口《法苏互助条约》违背《洛加诺公约》精神，遂通知英、法、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废止《洛加诺公约》，同时悍然将军队开进莱茵非军事区。

面对德国法西斯步步推进的战争图谋，1935年3月下旬，斯大林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谈话中斯大林强调国际局势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来自日本和德国，表示苏联“不可能闭着眼睛让德国武装起来去进行侵略，因此，当前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德国武装起来”。

斯大林在这里提到日本，盖因当时苏联更现实的直接危险是来自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因此，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有效地捍卫东部边境的安全，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苏联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务。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乃至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以来，苏联对此都持谨慎、中立态度，甚至日本已侵犯到苏联的利益时，苏联也作出一定的让步。但苏联的一再忍让，竭力避免卷入同日本的武装冲突的外交政策，反而加速了日本的军事挑衅。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就发生了80多次武装冲突。

## 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



秦维宪